



傅修海 著

现代中国文学考察笔记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现代中国文学考察笔记

傅修海 著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考察笔记/傅修海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5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南帆, 刘小新主编)

ISBN 978-7-5550-0779-1

I. ①现… II. ①傅…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8556 号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现代中国文学考察笔记

傅修海 著

责任编辑 李永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779-1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 南帆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是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

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八十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

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一九八〇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如今，“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

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

重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九十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朱双一、刘小新、朱立立和袁勇麟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于闽籍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

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的心目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二十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新生代批评家的加盟，即是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唯有新生力量的持续涌现并且不断发出独特的声音，“闽派批评”才能真正重新出发，发扬光大。新生代批评家大多具有严谨的学术训练，理论视野开阔，他们代表了“闽派批评”的未来。编辑出版“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即是集中展示这些新生代批评家的实力与个性，注释“闽派批评”这个称谓的崭新内涵。

是为序。

（南帆，本名张帆，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序

◎ 王光明

自 2013 年 11 月北京香山会议重提“闽派批评”的话题后，由于故乡宣传部门的大力推动，这个文化现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有“高峰论坛”的研讨，还有“闽派批评”文丛的编辑出版；不仅关注“闽派批评”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也重视那些小荷露尖、锋芒初现的新生代。修海等一批更年轻的作者，成了“闽派批评新锐丛书”的新成员。

这真令人欣慰和鼓舞，不仅仅为了“闽派批评”的前赴后继、薪火相传，也为了通过“闽派批评”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生养这种文化现象的土地和传统。

在 2014 年“闽派文艺理论批评家高峰论坛”上，我曾提到形成“闽派批评”的三个因素：历史的机缘、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以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在谈到影响闽派批评家的观物立场和表达风格的因素时，我请大家留意八闽山水在我们心灵无声的“沉淀”。我的意思是，“闽派批评”虽然被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历史的机缘所催生，但时代的偶然中实在有着历史的必然。因为“闽派批评”从根本上看，就像现代中国革命史中闻名全国的才溪乡一样，都是地域文化性格和传统的衍生物。

才溪乡现象不过是闽人不安分性格的一个现代镜像，更早与更为典型的现象是闽南人的下南洋和闽地盛产文化怪杰的现象，如从柳永、李贽到辜鸿铭和林语堂。八闽本是一块蛮夷之地，西晋末才开始与北方文化汇通融合，即所谓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如闽者八族”。而北方文化进入武夷山腹地，被山风海潮吹刮淘洗，沉淀下来的就是那种山一样坚韧、海一般不安分的性格气质，即使迎接失败，也仍是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当这种性格气质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闽南民歌《爱拼才会赢》所唱的打拼精神；当它往人文方向发展，便是不甘因袭、循规蹈矩，总想另拓新途，创格维新。

我相信所有的闽派批评家都带有这种精神烙印，年轻的傅修海也与这种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修海说自己从事文学批评原也是无心插柳，“我是为了生计而求学问，尽管听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为真理而献身’，但为生计的认真刻苦，与寻道问学求真务实，两者还是有内在联系的罢”。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修海尚且如此，又遑论困顿、封闭环境中成长的前几代批评家。实际上不仅是批评家，当年闽西的革命斗争名扬天下，一个小小的才溪乡后来就有十几人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将领，那么多人提着头颅闹革命，恐怕也先是为生存求解放，而后才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只不过，他们不安分的性格有着朴素与艰韧品性的支持，在走出武夷山后能与广大的世界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因而最终能够让可能成为必然。

不是所有的可能都会成为必然，地域性精神气象正如性情有其不同的两用。这次修海坚持要我为他的新著写序，我让他寄来了他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瞿秋白是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文艺思想史上的一枝奇葩，他1935年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汀，那颗枪弹让我故乡的土地今天还觉得疼痛。而我让修海寄这部专著，就是想更深了解书生性情与时代风云的迎拒纠缠关系。修海从第一手材料入手，深

刻论述了一个至情至性的文人遭遇一个大时代的“丰富与痛苦”，得到他的导师、著名学者林岗先生的表扬，认为修海知人论世，认真发掘、把握了瞿秋白新与旧、现代与古典对立因素的融化综合，“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与史识”。通过研究瞿秋白和他的时代，修海得到的，应该不止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磨练，还有人生的启迪吧？

修海现在出版的这部《现代中国文学考察笔记》，不是专题著述，而是一个年轻闽派批评家成长的脚印。你读读《赵树理的革命叙事和乡土经验——以〈小二黑结婚〉的再解读为中心》《亭子间：都市蜗居的思想史——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与反思——以瞿秋白为中心》等篇章，想来会对作者的视野、眼光和学识有所认识：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不仅有良好的文学感觉和分析能力，还有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背景，因此重评《小二黑结婚》这样“文学思想史意味超过了文学史贡献”的小说，不仅能发现其“问题小说”脉络上从提问题到给出方案的历史进展，还从苦闷转化、乡土经验和民间趣味的革命利用等方面，丝丝入扣地梳理了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进程。而《趣味——情绪主义审美思潮的崛起》等面对现实问题的评论，则体现了作者对当前问题的敏感和迅速归类、命名的能力，行文则锐利而洒脱。譬如这段对“惊心”趣味的议论：

当下社会抹煞一切区别的平庸日常，使得人们的审美情绪特别需要刺激需要惊心；当下消费的无限欲望，使得“惊心”本身成为消费焦点和卖点。现代性的悖论，就是现代性本身也遭遇现代性，于是后现代被迅速而泛滥地用来描述这种把现代本身“化”掉的尴尬和荒诞。同样，不甘平庸、追求超越的审美精神和情绪释放要求，本身成为消费社会的审美买卖机制的环节，从而加速着审美情绪“震”常化的频率和当量，更加剧了审美疲劳的程度，给本来需要释放和敏感的审美心灵，又包裹上一层防弹衣。

读傅修海等年轻一代“闽派批评家”充满真知灼见和才华横溢的文章，真的觉得自愧弗如。我由衷地认为，不知不觉中沉淀下来的地域性文化气质，在他们身上当有更合理和健全的发扬。我相信，他们将代表“闽派批评”的未来。

是为序。

2015年9月3日

目 录

上编 作家与作品批评

赵树理的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

——以《小二黑结婚》的再解读为中心 (3)

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

——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20)

小说结构节奏论的兴起及其他

——兼及《白门柳》的意义 (31)

被虚无笼罩的追求

——阎连科小说《风雅颂》的叩问及其他 (39)

心灵深处的温暖

——读陈旭红的《白莲浦》 (45)

北村：写作的皈依与摇摆

——从《施洗的河》到《强暴》 (52)

呓语·诗意·怀想

——迟子建的小说艺术及其价值试估 (59)

中编 文学与文化研究

文艺“欧化”：一个世纪性的心结 (69)

典型·非典型：现代中国文学的形象政治与身份焦虑

——以《阿Q正传》中“吴妈”形象的再解读为中心 (89)

纸墨寿于金石：民国文学现场中的《海上述林》

——以鲁迅为观察点 (103)

亭子间：都市蜗居的思想史

——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为中心 (118)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与反思

- 以瞿秋白为中心 (127)
文学研究的一次当代转型
——谈 1958 年《文学研究》杂志的改版 (145)
新的文学史叙述原则的兴起
——以《罪与文学》为中心的相关思考 (151)

下编 思潮与现象观察

非经典理论时代的来临

- 从“经典”与“民间”说起 (167)
趣味——情绪主义审美思潮的崛起 (176)
非物质：一个新文化视野的生成
——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开去 (182)
“非虚构写作”漫议 (188)
生态还是心态

- “生态文学”、“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的断想 (196)
当下文学的生态症候：参与重构的生存
——以王蒙、北村、迟子建、韩寒为例 (202)
寂寞喧嚣：中国情境里的粉丝文化 (214)
微媒体、自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 (220)
大数据与小时代下的文学研究 (224)
文学的当下之想 (229)

附录

朴素的力量

- 傅修海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视野与魅力 汤伏祥 (235)
傅修海学术简表 (241)

后记

- 给王光明老师的一封邮件（代后记） (247)

赵树理的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

——读《小二黑结婚》与《李家庄的变迁》

上篇 作家与作家批评

《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的两部代表作，也是他“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两个典型范本。《小二黑结婚》一书的出版，使赵树理从一个纯朴的山野农夫变成了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而《李家庄的变迁》则使赵树理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有理想的文学家。这两部作品都是赵树理的代表作，但它们却分别代表了赵树理人生道路上的两个阶段：革命与文学。

《小二黑结婚》为什么没有成为作家？因为赵树理既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在《文学与人生》中，赵树理自己也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已经当过许多种小工，经常写作就是我的文学训练。”

《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都是赵树理的代表作，也是他“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两个典型范本。但是他的重要却是有代表性的，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都离不开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都是赵树理的代表作，也是他“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两个典型范本。但是他的重要却是有代表性的，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都离不开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都是赵树理的代表作，也是他“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两个典型范本。但是他的重要却是有代表性的，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都离不开赵树理。

